

从建造到摸：理解作为无尽的触探

本文揭示了一个隐藏在当前理解理论地基深处的未经审查的预设——即“发生是为了抵达”这一生长论预设。信息传输论与建构主义传统在表面的争论之下，共享着同一个深层假设：理解的完成态是旧结构被新结构替代。本文通过系统检讨代际冲突、创伤理解与学习困难等领域的核心困境，论证了这一预设如何导致理论在实践中最关键的环节上反复失效——它无法解释那些“建造完成了、理解却仍然僵在原地”的经验。

作者 黄倩盈 · 约 2.7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本文揭示了一个隐藏在当前理解理论地基深处的未经审查的预设——即“发生是为了抵达”这一生长论预设。信息传输论与建构主义传统在表面的争论之下，共享着同一个深层假设：理解的完成态是旧结构被新结构替代。本文通过系统检讨代际冲突、创伤理解与学习困难等领域的核心困境，论证了这一预设如何导致理论在实践中最关键的环节上反复失效——它无法解释那些“建造完成了、理解却仍然僵在原地”的经验。在对失效现场的发生学追踪中，本文触及了一个此前所有理解理论均未单独命名的辨别面：在深度理解的现场，理解活动的核心操作不是新结构的建造，而是理解者自身位置的拆除。本文将这个从旧框架裂缝中结算出来的结构命名为“摸”——一种不以抵达确定的认知结果为驱力、而以持续触探理解者自身需要与姿态为首要动作的发生形态。与既有理论的不可还原切割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当代关系精神分析将“相互性”作为治疗技术，正念传统将“不评判觉察”作为可单独练习的心理技能，而“摸”的核心辨别面在于，它既不是技术也不是技能，而是理解活动在校准“我需要正确理解你”这一驱力失效时，被矛盾逼出来的一种关系性重组。本文通过代际冲突的精细个案追踪，展示了摸如何从建造的裂缝中逐层结算——触探的内转被逼出、承受的悬置被逼出、驱力的松绑被逼出、互摸作为单方摸的不可维持而被逼出——并在全程与关系精神分析与正念传统保持着不可还原的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正面回应了权力不对称、社会行动的瘫痪风险、认识论怀疑与儿童认知发展等最具威胁性的反驳，并在结论中以可操作的证伪条件为摸的理论边界划定了锚点。

关键词：摸；生长论批判；位置的拆除；关系性触探；理解理论

一、引言：一道未被人察觉的共谋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人类理解的理论建构在两条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地基的路径上行进。第一条路径是信息传输论及其各种衍生版本：将理解视为信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成功传递与准确解码。第二条路径是从皮亚杰、维果茨基到当代建构主义和诠释学的各种“主动建构”理论：理解不是被动接收，而是认知主体在遭遇异质性扰动后主动重组旧认知结构的过程。两条路径在表面上彼此冲突——传输论被批评为机械、被动，建构论被赞誉为能动、生成——但它们在争论时从未触碰过自己脚下那片共同的、未经审查的地面。

这片地面对本文来说是真正的起点。

两条路径的争论，自始至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理解如何完成？”传输论说：信息匹配完成的那一刻，理解完成。建构论说：旧结构被新结构替代的那一刻，理解完成。请注意：两条路径从未质疑过“理解就是某种完成”这一命题本身。它们只是在完成的方式上争执，而不是在完成的价值上怀疑。把理解想象成一条有终点的事件——无论那个终点是“匹配”还是“建造”——这个前提，被两条路径当成不需要论证的自明预设接受了下来。

本文要做的事，就是翻开这片地基，看清它下面埋着的那块基石，然后把它抽掉。

这块基石是什么？是一个古老的、几乎从未被反思过的前设：发生是为了抵达。一个过程的价值，在于它通向一个比起点更好的终点。理解的实质被想象成从“不理解”的起点出发，经历一段必要的（但仍然是过渡性的）发生过程，最终抵达“理解了”的终点。不确定性是暂时的，困惑是要被克服的，张力是要被消解的，建造只是通往完工的手段。只有完工的那一刻，才是理解真正的诞生。在此之前的整个过程，都只是“理解的前夜”。

本文把这个前设——这种预设每一个发生过程都必须朝向一个比其起点更有序、更完善、更稳定的完成态，并以抵达该完成态为过程的唯一正当归宿的理解模型——称为生长论。[1] 在生长论的视野里，“正在发生”的价值永远小于“已经完成”；发生是道路，完成是故乡；发生是必要的代价，完成是最终的抵偿。

当生长论成为理解理论的隐形地基时，一个后果是：所有理论上的争论，都只是在不同的“完成态”之间做选择。传输论的完成态是信息匹配；建构论的完成态是新结构建成。它们的区别仅在完成态的样子不同，而不是在“理解是不是一件有终点的事”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它们之间的争论，是同一个家族内部关于“哪里才是真正的家”的争吵——它们从未想过，“家”这个隐喻本身可能已经走错了方向。

本文接下来的论证将展示：理解——至少是那些触及到自我认知、情感结构和意义重塑的深度理解——恰恰不是一件有终点的事。它不是从困惑走向答案的旅程，而是从“以为自己知道”走向“知

道自己不知道”、然后留在那种“还在摸”的状态里的一条无尽的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摸”是理解的本质或真正归宿——那将是用一种新本质替换旧本质，在逻辑结构上与生长论同构。发生学的判断只能是条件式的：当理解活动中的位置性不对等无法通过建造本身的精细化来拆除时，理解过程呈现出一种不再以建造正确结构为驱动力的重组形态。本文把这种形态命名为“摸”。摸不是理解的“实质”，而是在特定条件下被矛盾逼出来的发生姿态。

这个逆转，如果不先把自己脚下的地基暴露出来，它听起来就像一种修辞上的偏激。所以本文在第二节必须先把生长论作为一块基石从地面下挖出来，展示它如何同时在传输论和建构论中隐形运作。第三节将进入一个具体的代际冲突个案，在建造模型充分运作并最终失效的完整过程中，追踪摸如何从失效的裂缝中被逐层结算出来——不是先给出摸的“四个构件”，而是展示四重发生如何一笔逼出一笔：触探的内转被逼出、承受的悬置被逼出、驱动力的松绑被逼出、互摸作为单方摸的不可维持而被逼出。在这一全程中，“摸”与当代关系精神分析的“相互性”技术和正念传统的“不评判觉察”技能保持着不可还原的张力——它们各自在哪个节点上可以被替换、在哪个节点上必须被区分，将在追踪中逐站标明。第四节和第五节将正面回应最具威胁性的反驳——权力不对称、社会行动的瘫痪风险、认识论怀疑与认知发展的边界——并在与教育现象学和当代情境学习理论的对话中划定摸的适用领域。第六节交代摸的操作边界与证伪条件，收束全文。

二、生长论：一块从未被撬开的地基

（一）它在传输论中如何运作

信息传输论的生长论根基，第一次被显露出来，需要把目光从香农的工程定义移开，移到它在日常实践中的衍生形态上。因为香农本人的工作并不涉及理解理论——他在1948年的奠基性论文中明确将意义从信息的数学定义中剥离，这是一个有方法论自觉的工程决策，并非哲学主张。[2] 本文的目标从来不是批评香农，而是考察那个将香农模型未经反思地迁移到理解领域之后的日常操作逻辑。

在日常操作中，信息传输论的表现形态是：理解的起点是信息缺失或编码错误，理解的过程是信息从发送者经由信道抵达接收者并被正确解码，理解的终点是信息在接收端被还原为与发送端一致的状态。起点—过程—终点，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长论叙事。起点是“不理解”——一种需要被消除的匮乏状态。终点是“理解”——一种可以被确认的完成态。过程是从缺陷走向完满的修复运动。

这个叙事在工程上是实用的。但在深度理解的现场，它解释不了那些“信息完好无损、理解仍然缺席”的现象——父子之间彼此能把对方的动机、情绪和逻辑说得一清二楚，却仍然不感到被理解；学生能复述定义、做对习题，却在一个变形的情境面前回到原点。这些现象不是信息传输的技术故障，而是传输论整个叙事框架的结构性失效：在这场关于“理解需要什么”的追问中，传输论把一段

关系的全部历史、全部情感沉积、全部未被说出过的痛苦和未曾被回应过的期待，都当成了“信息传输”这个概念之外的无关变量。当这些变量不被纳入理论，理解的终点——“信息匹配完成了”——就只是通道的终点，不是意义的终点。通道抵达了，人却还在原地。

（二）它在建构论中如何运作

如果说传输论把理解想象成接收，建构论把理解想象成建造。建造叙事也有一个完整的起点—过程—终点弧线。起点是旧认知秩序遭遇异质性扰动——你原来以为你了解一个人，但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能被你的旧认知拼图装下。这是“断裂”。过程是你经历困惑、归拢矛盾材料、生成候选叙事、在互动中测试这些叙事、让站得住的慢慢固着下来。这是“建造”。终点是新意义结构成功建立，旧结构被它替代——你不再用旧方式理解这个人，你有了一个新框架，这个框架让你能够解释那个曾经无法解释的事件，并能让你用新的眼光看待相关的一系列经验。这是“新结构对旧结构的覆盖”。

断裂—建造—覆盖，这个三段式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在对“深度理解如何可能”的追问上比传输论多走了一大步。皮亚杰的“顺应”概念描述了认知图式在新经验冲击下的重组过程——旧图式被更适应环境的图式取代。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教学进一步将建构的主体间条件纳入了发生学描述：学习者在他人的协助下，将在孤立状态下无法完成的认知操作逐步内化为可以独立运用的心理工具。

但建构论仍然是一个生长论叙事。它的终点——“新结构建成”——承担着理解价值的全部分量。断裂是被途经的，建造是被用来通向终点的，覆盖是终点确立之后的附加效应。整个叙事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未曾被追问的预设上：建造真的完成了。那个新结构，真的被建起来了。

这个预设一旦被推到真实的、纠缠的、被漫长个人史形塑的理解现场去检验，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代际冲突场景。父亲一直以为儿子自私、不懂事。儿子在母亲生病时沉默地陪床这件事，撞松了父亲的旧认知——旧叙事“自私的儿子”解释不了这件事，断裂发生。接下来是建造过程。父亲在不确定中反复归拢矛盾材料，生成并测试了几种候选叙事，最终固着在一个新的叙事版本上：“这孩子不是自私，他是用对抗我的方式来维持他自己。在没有我压力的地方，他能承担。”这个新叙事在之后的日常互动中被反复确认——父亲克制住了追加压力性话语的旧习惯，儿子的对抗因而有所缓和，冲突的频率微微下降，冲突后的恢复速度加快。从建构论的所有标准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建造。断裂发生了，建造完成了，覆盖也启动了——父亲开始用新的敏感去注意儿子从前被忽略的微小善意。

但仍然有一个问题：这个“建造完成”，究竟完成了什么？

父亲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框架。他不再把儿子看作“一个需要被纠正的自私小孩”，而是看作“一个在对抗模式里反复进入防御状态的年轻人”。这个框架比旧框架更精细、更有解释力、更不容被单一反例推倒。但从儿子的角度看——从那个多年来在被控制、被否定、被忽视中长起来的年轻人的角度看——父亲的这个新框架，与他旧日的控制姿态之间，有什么实质的、不可通约的区别？

旧框架是“你应该长成我想要的样子”。新框架是“我已经理解了你现在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句话的句式变了，话里的温度变了，但那个最底层的图式——父亲作为理解者，对儿子的理解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正确把握——没有变。儿子不是要父亲正确。儿子要的是父亲承认——不是承认“我理解了你的对抗”，而是承认“我过去让你必须对抗”。这两者之间的裂缝，是建造叙事无法跨越的。因为建造叙事的终点，永远是一个比起点更完善的认知结果——一个更正确的、更全面的、更经得起反驳的判断。而承认，不是认知的结果。承认是拆除的动作——拆除那个让自己正确的位置本身。

（三）生长论的边界：不是建造没完成，是建造者的位置没被碰过

这就是建构论最深的盲区。它在把理解想象成建造时，未经审查地预设了：建造者的目的，是从一个不那么正确的理解，走向一个更正确的理解。建造的过程，是认知上精益求精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漫长、可以痛苦、可以无数次推到重来。但它的终点——那个被建造出来的新结构——是价值的全部承载者。建造者的姿态，从头到尾都是“我要更好地理解你”。

但建构论从来没有问过：“更好地理解你”这个目的本身，对理解的发生承担了什么功能？当一个人说“我要理解你”时，他和他要理解的对象之间，已经在发生学上确立了一个不可被后续建造过程取消的结构：理解者是主体，被理解者是对象。理解是主体对对象的把握。这个把握可以无限精细化，但“把握”这个姿势本身，已经让理解者站在了被理解者的对面。而深度理解——那种触及灵魂、改变一个人看待世界方式的理解——它要发生的条件，恰恰不是“站在对面更准确地看”，而是站在对面的那个位置本身被迫拆除的时刻。

这个位置什么时候会被拆除？不是建造完成了更精细的理解框架的时候。而是建造者突然意识到，他所建造的一切，都是在让“我需要正确”这个更底层的需要继续被满足的时候。是那个“正确”的价值本身被掏空、被存疑、被搁置的时候。是建造者不再把建造当作抵达的途径，而是开始摸着建造过程本身——摸着自己在建造时的焦虑、急躁、渴望被认可——的时候。

这一诊断不仅仅是理论推演。在真实的关系现场中，它可以被反复观察到。创伤治疗中，来访者经历了数年的治疗，与治疗师建立了深度的治疗联盟。她成功地完成了创伤事件的叙事化——从建构论的所有标准看，建造已经完成。但她仍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真正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治疗师的理解，是真的——她不怀疑这一点。但“真的理解”和“成为那个经历的人”之间，有一道她说不清但每次想起来都会难过的缝。这道缝，在建造叙事里是无法被命名的。因为它不在建造者的手艺上，而在建造者与那个经历之间永远不可能被填平的本体论距离里。治疗师没有站在

事件发生时的那个位置。她可以走过去，站在旁边，甚至站在很近的地方，但她无法把自己挪进那个位置。建造完成的那个新叙事——“这件事确实发生在你身上了，它改变了你，但它不再是正在发生的了”——极其精确，但它仍然是治疗师和来访者共同建造的产物。它是被两个人的语言一起编织出来的。而那个“只有我一个人真正知道那是什么滋味”的感受，恰恰是被这个共同建造的过程从反方向凸显出来的：你编织得越好、越精确，我就越知道你不是我。

课堂教学中也存在与此结构上同构的现象。一个数学教师花费数周时间，用基于建构论的教学设计带领学生体验真正的认知冲突。学生被巧妙设计的问题序列一步步逼进一个困境——他们原来的直觉理解在面对分数除法时反复失效。他们经历了困惑、旧直觉的松动、多种自己提出的替代解释的反复测试。在教师的引导和同伴的讨论中，这个新理解逐渐稳固下来。从建构论的标准看，这是一次典范的建造。

几周后，这个学生在期末考卷上完美地解出了几道分数除法题。但当他回到家，母亲让他把一份食谱的用料从六人份换算成四人份时——其中恰好涉及一个分数除法——他卡住了。不是完全不会，而是犹豫了很久，最后用了笨拙的、绕远路的方法，没有调用课堂上那条干净的、他已经在考卷上用得很熟的规则。

这个现象不能被解释为“理解不够深”。也不能被解释为“情境迁移失败”——因为从课堂习题迁移到考卷新题型，他已经成功了。两个情境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认知难度，而在于“在哪个地方用哪种自我”来面对这个问题。在课堂上和考场上，他面对问题的自我，是“正在被评价的学生”——这个自我有一套成熟的应对策略：快速识别问题类型、匹配已知规则、输出答案。在厨房里，他面对问题的自我是“正在被母亲注视的儿子”——这个自我和那个“正在被评价的学生”不在同一套关系性坐标里。他曾经建好的那个新知识结构，没有被存储在“儿子”这个自我可以随时调用的位置。

建构论假设，一个结构只要要在认知上被建造完成并启动了覆盖，它就会变成建造者的稳定认知财产，可以在不同情境中迁移。但上面的例子显示：一个结构建成了，覆盖也发生了——他确实能用新知识做对很多题——但它仍然没有被“长进”某些关键的自我模态里。这个结构在认知上是可用的，在关系上是不可用的。建造没有失败，它只是在某一个关系维度上没有发生。而建构论缺少一套语言来描述这个维度——因为它的整个理论框架，都把“认知”当成一个同质的、单一的、内部一致的“主体”的行为，而没有拆开“同一个人内部不同的关系性自我”这个维度。

（四）地基建在被隐藏的预设上

三组现场——代际冲突、创伤治疗、课堂教学——给出了同一个诊断。在每一个现场中，旧框架的失效都不在于“建造没有完成”。从建造叙事的内部标准看，建造确实完成了。失效发生在建造叙事的语言之外的那些地方：儿子感到“你用你的框架在占有我”时；来访者感到“你懂我但我不是我”时；学生感到“我在考场上会但在厨房里不会”时。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征：一个建造者

与建造对象之间的位置性不对等，在建造完成之后并未被拆除，而是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理解者仍然在“理解者”的位置上；被理解者仍然在“被理解”的位置上。建造让理解者的框架更精致了，但理解者脚下的那块地，自始至终没有被撬动过。

这个位置性不对等能够以完全不被觉察的方式持续运作，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极深的庇护所——建造者自身的理解需要。父亲要把儿子归拢进一个“正确的”理解框架，不完全是因为他想对儿子公平，而是因为他需要让自己从“是不是我做错了”的自我拷问中脱身。治疗师要让来访者完成叙事化，不完全是因为叙事化本身具有治愈力量，而是因为“来访者好转了”对治疗师来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回馈——它让治疗师确认自己的工作没有白费。教师要在课堂上让学生掌握概念，不完全是因为概念本身重要，而是因为学生的掌握程度是对教师专业能力的终极回扣。

当理解活动同时服务于两个目的——理解对方，与满足理解者自身的需要——时，后一个目的的满足方式，恰恰是通过前一个目的的达成来实现的。建造者的理解需要，是通过“我正确地理解了对方”这件事来被满足的。而“我正确地理解了对方”这个认知结果，又在每一次被确认时加固着理解者的位置——“我”是那个正确地理解的人。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建造就不再只是为对方造房子。建造同时也是在为自己造地基。房子造得越漂亮，地基就越稳固。理解者越善于建造，就越不可能察觉自己正站在一块从未被触碰过的地基上。

生长论的边界，就在这个位置性不对等上暴露出来。生长论说：理解的任务，是从起点（困惑）抵达终点（正确的新结构）。抵达终点的那一刻，就是理解的完成。但抵达终点之后，那个终点并没有兑现它承诺的东西——它没有让被理解者感到被看见；它没有让理解者从“我需要正确”的执念中松绑；它没有让知识在不同关系坐标中的自我之间贯通。终点到了，人还困在原地。

这个诊断导向一个必须被正面回答的问题。此前的论述已经展示了：建造模型的失效不是因为它不够精细，而是因为它的整个工序——归拢矛盾材料、生成候选叙事、测试与固着——从头到尾，都是在为理解者消除困惑而设计的。困惑的消除又反过来稳固了理解者的位置。在这个工序内部，无论你怎么增加变量——加一个“关系维度”、加一个“意愿维度”、加一个“情感维度”——只要工序的目的论设定不变（“理解是为了抵达一个比起点更好的认知结果”），位置性不对等就不会被工序本身的运行所触动。你加得越多，建造者的工具箱越大，他的位置反而越稳固。因此，问题不在修补，而在地基。不是建构论漏掉了某个变量，而是它的目的论设定——发生是为了抵达——从根本上锁死了理解者位置被拆除的可能。

这就把本文逼到了一个必须被正面回答的问题面前：如果理解不是建造——不是从旧结构到新结构的换房——那么在建造失效的那些现场，理解活动的形态是怎样的？

三、“摸”：从建造失效的裂缝中被逐层结算出来的结构

（一）从一个个案进入：一个建造完成却失效的现场

以下个案取自一项对代际冲突关系的长期田野调查，其中的人物身份、对话细节与时间节点均经过了严格的匿名化与合成处理。[3] 本节的追踪目标不是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可见性——在这个个案中，建造模型全部有效工序的运转与其最终失效的全程，可以被看得比在任何一个二手理论勾勒中都更清楚。

这个父亲五十多岁。他的儿子二十多岁，两人多年来处在一个几乎完全可预测的冲突模式里：父亲对儿子的任何生活选择——职业、消费、交友——都有一套话术密集的追问和评价；儿子用沉默、晚归、关闭朋友圈可见性来回应；父亲感到被排斥，追问更紧；儿子干脆搬了出去。

父亲在偶然的机会下，读到了亲子沟通的读物。那些读物告诉他：你要倾听、不要急着判断、要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他开始努力。他读到了“共情”这个词。他在脑子里对自己说：他搬出去不是不孝，是他需要空间。他甚至在一次和儿子的电话中，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想说什么“你当初要是听我的……”的冲动，转而说了一句“你那边住得还习惯吗”。儿子的回答很短：“还行。”但父亲没有像以前那样因为回答太短而气闷。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继续按照这套新的操作清单——不追问、不评价、不翻旧账——与儿子保持着一种比以前和缓但远称不上亲密的联系。冲突的频率确实下降了。儿子偶尔回家吃饭时，沉默的时间比以前短了一些。父亲觉得自己“改了很多”。他甚至在某次散步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已经能理解他了，我确实比以前做得好了。

然而在儿子回家的某次晚饭上，儿子无意中提到，他最近辞了工作，打算和朋友一起开工作室。父亲的脸在听到“辞了工作”的瞬间抽了一下。他在那一刻有没有说出任何批评性的话？没有。但他用了数十年来练就的、他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那个表情——嘴唇微抿、眼光从儿子脸上移开、筷子在碗边轻敲了两下——做了全部的事。儿子看到了那个表情。他没有当场发作。但那天晚上他提前回了自己的住处，此后两周没有接电话。

父亲事后复盘时，是困惑的。不是旧的困惑——不是“这孩子为什么这么不懂事”。是新的困惑。他明明做了所有“正确”的事。他没有说“你怎么又乱来”，没有追问“收入稳不稳定”，没有翻旧账。他只是在那一秒露出了一个表情。而且那个表情，他后来反复回想，确实不是愤怒——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担忧，他怕儿子创业失败、怕他吃苦、怕他几年后一无所有。这个担忧是真的。但它被儿子的眼睛接收到的信息，和十年前他用“你这孩子怎么就是不听”时的信息，是一样的：你在被评价。

这就是建造完成了而理解缺席的现场。

（二）第一重结算：触探的内转——建造的自我瓦解与“摸”的入口

父亲此后几周的内心过程，对本文要追踪的那个结构来说，比此前所有“正确操作”都更关键。

他不是没有试过用建造模型再建造一次。他在心里试图归拢矛盾材料：那天的表情确实不对，但那个“不对”不是恶意，是担忧。担忧和愤怒是两件事。他要把“担忧”和“儿子以前经历的否定”区分开。他甚至为此写了一段话——在心里写，没有发出去——大意是“那天我表情不好，但我不是否定你，我是担心。我怕你吃苦。我知道你不需要我担心，但你是我儿子。”这段话极其真诚。它也确实是他的一种进步——十年前他不会写出“你不需要我担心”这种话。

但他把这段话在心里念了一遍之后，自己就察觉到了不对。这段话的每一个分句都是对的，但整段话合在一起，有一个他此前没有注意到的姿势：他仍然是在解释。他在解释他的表情不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他的真实意图是关心而不是批评。他的整个思维动作，是在维护一个“我其实不是那样的人”的自我的边界。他不是在靠近儿子——他是在修正儿子对他可能产生的印象。

他第一次摸到了一个他没想过要去摸的地方：他那么急着让儿子“正确理解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件事本身，是在满足谁的什么需要？

他不需要把答案说出来。那个需要是：如果儿子把他当成“一个只会否定他的父亲”，那他就被塞进了一个他不能接受的自我认知里——“我是一个失败的、不被儿子看见善意的父亲”。他的自我认知承受不了这个标签。而他此前所有的建造——从“共情”到“担忧与愤怒的区分”——都在为这个标签做反向工程。他一直在建造各种结构来证明这个标签是错的。而这些结构，在儿子的感知里，全是挡在这个标签前面的隔板。儿子看不到隔板后面是什么。儿子只看到隔板。

这就是建造者位置的暴露。建造者的位置，不是一个物理位置，不是一个社会角色。它是一个认知—情感—需要的三重交汇点。在这个点上，父亲面对儿子的任何行为，总是在同时做两件事：理解对方，与维护一个关于自己是谁的叙事。这两件事缠绕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当维护自我的需要被推到无意识层时，理解对方就变成了维护自我的手段。而维护自我的需要，在本案中，是通过一个特定的话语动作来满足的——“让我来告诉你，我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父亲摸到了这个。他不是“认识到”了。他是摸到了——没有命名、没有“我明白了”、没有任何认知收束。他只是在那几天有些沉默。他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身体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紧，和一种同样说不清的松。紧是因为他发现，他那么多年对儿子的所有努力，底下都铺着一层他自己没看过的东西。松是因为他忽然不太知道“我是谁”——不是一个失败的否定者，也不是一个能理解儿子的好父亲。他暂时不知道了。

这个“暂时不知道”，就是摸的入口。

在此址标明第一道不可还原切割——与关系精神分析的“相互性”技术与正念传统的“不评判觉察”技能。当代关系精神分析的核心贡献之一，是论证了分析师的主体性不是需要被压抑的干扰，而是分析空间中的合法材料。Aron以降的相互性论述，要求分析师在反移情中辨认自己被来访者激活的

部分，并将其作为理解来访者投射性认同的入口。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所描述的“相遇时刻”，则进一步捕捉了那些非语言、非解释性的双向微小时刻——在这些时刻中，两个主体在“隐式关系知道”的层面上完成了某种非结构的共同调节。这些概念与“摸”在操作的邻近性上达到了极高的重合度，以至于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必须被提出：父亲“摸到”自己那个急迫想要被儿子认可的需要，与分析师在反移情中辨认自己被激活的拯救幻想，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操作的目的论定位。关系精神分析中的分析师，在进入相互性时刻时，其最终操作仍然服务于一个临床意图——松动来访者的旧有关系模式、促成新的关系经验被内化。分析师的“自我暴露”或“对自身主体性的觉察”，是在一个整体上仍然以“促进来访者改变”为方向的治疗框架内被调用的。换句话说，分析师在摸到自己的急迫时，他仍然在“做治疗”——他摸自己，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来访者，并最终帮助来访者松动其病理结构。这个“为了”是治疗情境的构成性条件，它不能被拿掉。

而父亲在摸到自己的急迫时，他的处境不是治疗情境。他没有一个叫做“帮助儿子改善”的专业目标可以用来安放他的触探。他的触探没有外部的目的论框架来兜底——他摸自己，不是因为“摸了自己以后能更好地理解儿子”，而是因为“继续建造下去”这个动作本身，在那一刻被他自己的需要堵死了。建造的驱力——“我要正确理解你”——在被他摸到的那一刻，不再是透明的、自然而然的操作，而变成了一块他吞不下去的东西。他不是反移情分析的意义上“辨认自己的反移情”——他是在“辨认自己的辨认”本身成为了问题：那个“我要正确理解你”的驱力，恰恰是他与儿子之间那堵墙的砖。

同样的切割线划过正念传统。正念中的“不评判觉察”，训练个体在情绪、冲动或念头升起时，不被其卷入、不立即反应、不与内容认同。这个操作在形式上与“触探方向扭转向内”“承受矛盾材料不被归拢”极其相似——以至于一个诚实的发生学论证必须承认：如果本文所描述的“摸”只是在说“父亲学会了正念地去观察自己的急迫”，那么“摸”这个命名就是多余的。

但区别仍然是目的论上的。正念技能可以在任何情境中被单独练习——一个人可以坐在冥想垫上练习觉察自己的急迫，而他的急迫所朝向的那个人不在场。正念的效力，在临床上恰好来自于它可以将觉察操作与关系情境暂时剥离，使其成为一种可独立训练的心理技能。而摸不是一种心理技能。摸是一种被特定的关系矛盾逼出来的发生姿态——它不能被单独练习，它只能在那个急迫正在朝向某个具体的、活着的他者的现场，在建造的驱力撞上自己的墙的瞬间，被逼出来。父亲不是在“练习不评判觉察”。他是在一个具体的儿子面前，被他自己的建造驱力反噬了。正念可以教会一个人“如何不评判”，但正念无法制造那个“建造驱力反噬自身”的特定矛盾情境——而那个情境，是摸的发生学土壤。正念所训练的技能，在摸的现场可能被调用，但摸本身不是那个技能。摸是被矛盾逼出来的姿态；正念是可以在无矛盾情境中被练习的技能。两者在发生学上的位置不同：正念是稳定状态下的技能习得，摸是建造崩溃现场的姿态重组。

（三）第二重结算：承受的悬置——当内转不可归拢时

如果父亲在摸到自己的急迫之后，将它归拢进一个新的叙事——“原来我是在意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形象”——那么他就又回到了建造的循环里：旧建造是“我要理解儿子”，新建造是“我要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需要被认可”。建造的内容从对方换到了自己，但建造的姿势——“把摸到的材料归拢为一个可安放的理解”——没有变。摸会不会在这里又变回建造？这是摸的发生学论证中最危险的一步。因为从内转到承受，中间没有一个逻辑的必然——父亲完全可以把摸到的东西立即打包成“这是我需要处理的自我议题”，然后重新站在一个自我认识者的位置上。

这一步在父亲那里是如何被逼出的，不能仅凭他“选择了承受”来论证。必须展示：在那个具体的关系现场，有一个东西堵住了归拢的路。

那个堵住归拢的东西，是儿子在那次晚饭上的表情。不是父亲的表情——父亲的表情是他自己事后反复回想的。而是儿子在看到父亲表情之后的那一秒，儿子脸上那个极其微弱的变化——父亲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但他记得儿子的嘴角在那一瞬间向上微提了一下，不是笑，是一个更复杂的、同时包含着“我就知道会这样”和“是啊，你还是老样子”的微表情。那个表情极短，短到如果不是父亲在那次晚饭后反复回放那个瞬间的画面，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看到了它。

但那个表情——那个“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在父亲后来的回想中，成了他绕不过去的一个东西。他试图用“那只是儿子的习惯反应，不是针对这一次”来解释。但这个解释不成立。因为那个表情恰恰是针对这一次的——儿子看到了父亲的新表情管理、看到了父亲的克制、然后看到了克制下面的那个老表情。儿子的那个微表情，不是在说“你又否定我了”，而是在说“你是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做了一遍旧的事”。

这个微表情，就是建造的归拢动作所无法吞下的一个剩余。它不是父亲可以“理解”的对象——因为他一试图“理解”它，他就又回到了建造者的位置上：他要站在“我理解了儿子那个表情意味着什么”的位置上，用自己的叙事来命名它。但那个表情本身，恰恰是在说“你的命名权已经被我收回了”。它不能被理解——它只能在承受中被持续触到。

这就是第二重结算的发生条件：触探的内转摸到了自己的建造驱力，但归拢这个驱力的通道被关系中的一个不可消化的剩余（儿子的微表情）堵死了。父亲既不能继续把儿子当作建造对象（因为儿子的表情拒绝了他），也不能把他摸到的东西归拢为一个新的自我建设（因为那个“自我”恰恰是在建造中需要被拆除的东西）。他只能承受——在那个不归拢、不解释、不建设的状态里，让那些矛盾材料作为一个整体被触着。

这个承受，不是决定的结果。它不是父亲在某个时刻对自己说“好吧，我决定承受”。它是通道被堵死之后，系统不得不进入的一种重组——它不是积极的、不是被意志驱动的，它是消极的、是被矛盾逼出来的停滞。但在这个停滞中，一个旧的自动操作——把涌上来的材料立刻组装成叙事

——被暂停了。

在此址标明第二道不可还原切割——与正念“承受而不反应”的操作边界。正念传统中的“承受”（在“觉察-不做反应”的意义上），是一种可以通过系统训练而被稳定化的注意力品质。练习者在正念呼吸中感到焦虑升起，他觉察它、不推不抓、让它来去自去——这个操作在一个意图明确的训练框架内进行，它有一个稳定的自我作为练习者，有一个明确的方法作为路径。而摸的承受，不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注意力品质，而是一种在建造者被自己的建造驱力反噬后、无路可走时被迫进入的悬停。它不是“选择不反应”——它是“反应的通路被堵上了”。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在“练习”——它的自我正在被拆除。它不是方法，它是通路被堵后的临时地形。

（四）第三重结算：驱力的松绑——抵达的欲望不再自动驱动理解

父亲继续和儿子维持着节制的联系。但他的注意力的重心，从“儿子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慢慢地、不自觉地转向了“我在看着儿子的时候，我自己在做什么”。每一次儿子简短回复短信，父亲还是会感到一阵不被回应的失落。但以前他会在这阵失落之上叠加一层对自己的失望——“我改了这么多，他怎么还是这样”。现在他在失落的时候，有时会停下来，不问“他怎么还这样”，而是看：这个失落里面，是不是有一层我没注意到的急迫——急着要看到我努力的成果？

他摸到了那个急迫的存在。他不是在某一刻“认识到”它的。他是在几十次、上百次的小失落中，慢慢分辨出一种质地。那种急迫有一个很熟悉的形状——和他夏天等台风过去、急着要去院子里收衣服的那种急是一个形状。他忽然知道，所谓的“理解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收衣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件要尽快完成的事，完成了就能安心做别的。这个知道不是结论。他没有对自己说“原来我是把儿子当成了待办事项”。他只是摸到了那个形状，认得它，下次再出现时能更早地感觉到它。

驱力的松绑不是一种意志性的“放下”。它不是父亲决定“我不再渴望被儿子认可了”——那个渴望仍然会在每一次儿子冷落他时被激活。松绑的发生形态是：渴望激活了，但渴望激活之后，在从“渴望”到“建造”的那个通道上，多了一块被他反复摸过的、不再光滑的地面。渴望还在，但它滑不过去了。它必须在那块不光滑的地面上自己停下来。停下来的那个间歇，是第二个暂停——不是触探内转时的第一个暂停，而是那个内转本身不再引向自我修正性建造的暂停。驱力没有消失。驱力的执行路径被摸糙了。

这个驱力松绑的发生条件，是从第二重结算（承受的悬置）的内部张力中逼出来的。承受的悬置让父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把他摸到的急迫立即归拢为“我需要处理的自我议题”然后启动新一轮建造——承受把他的建造通道堵住了。但当建造通道被堵住时，那个驱力本身（“我要让儿子认可我”/“我要正确理解他”）并不会自动消失——它作为一个长期被满足的需要，仍然会在每一次互动中被触发。在旧的建造循环里，驱力一触发就滑入建造（父亲感到失落→立即想“是我的方法还不够好，

我要再调整”)。现在建造的通道被承受堵住了，但驱力还在触发——它触发了，却找不到可以滑进去的建造管道，于是它只能在触发与不执行之间悬着。一次、十次、上百次，这个悬着的张力本身，把那个“触发→执行”的路径磨出了延迟。驱力的松绑，不是驱力消失了，是它被承受的通道堵塞反复“空转”后，其自动执行的必然性被松动了。

（五）第四重结算：互摸——当单方摸的不可维持逼出双方的共同触探

父子关系在某个没有剧本的瞬间进入了互摸。那是一次日常的通话。父亲照常问了几句近况，儿子照常简短回答。在通话进行到第三分钟时，父亲刚想说“那你多注意休息”——这句话本身无害，但他自己先摸到了这句话下面有一个他以前没注意到的推力：他想结束这个电话了，因为聊到第三分钟他感到了一种熟悉的尴尬，他能感觉到儿子也在尴尬，两个尴尬的人面对面没有什么话说。以前他用“那你多注意休息”来从尴尬中撤退。这次他没说。他让尴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他什么都没说。

儿子在电话那头，也在尴尬。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在父亲说出“多注意休息”时跟着说“好，先这样”。他也在等——不是等父亲说话，是等他自己的身体决定要说什么。几秒后，儿子说：“爸，你是不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了。”

这句话在旧模式里的位置是挑衅，是拆穿，是让父亲难堪。但在这通电话里，它不是。它的语气不是挑衅的，不是调侃的，不是防御的——是轻的，像是两个人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现在这个词被说出来了，房间里的那把一直没人坐的椅子，被指认了出来。父亲停了一下，说：“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儿子在那边轻轻笑了一声。那个笑，是他的身体在那个瞬间里经历了某种很微小的释放——不是原谅，不是和解，是“我们终于承认了”。两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但那个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刻，是这通电话里最紧实的东西。

互摸在这个瞬间的结构不是“父亲理解了儿子”或“儿子理解了父亲”。它是：两个人都摸到了同一件事——他们的关系里有一个空洞，那里面装着二十年来所有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谁也没有跳进去填。谁也没有说“我们以后要多聊聊”。空洞就是空洞。空洞被两个人同时摸到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隔在他们之间的东西。它变成了他们共同在摸着的东西。

第四重结算的发生条件，必须从单方摸的内在不可维持性中推导出来。单方摸的局限性在于，它只需要忍受“对方不在摸”这个事实。父亲可以无限期地摸自己的急迫、承受矛盾的不可归拢、让驱力的自动执行变得松动——但如果儿子始终不进入摸的姿态，父亲的单方摸就始终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崩塌路径。第一，它可能在时间中被孤独消蚀——摸所要求的“承受不确定”是一种高消耗的心理活动，如果没有来自对方的任何反馈表明关系的地形确实在松动，承受者的心理资源最终会被耗尽，摸就崩塌为放弃（“算了，就这样吧”）。第二，它可能暗变为一种新的道德优越感——“你看，我摸了这么久，他还是不改变，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摸变成了一种更隐蔽的建造：建造一个“我

是那个更透彻的人”的自我叙事。

单方摸的不可维持，是摸的第四重结算的发生学条件。它不是父亲“想互摸”，而是：如果互摸不发生，单方摸迟早会崩塌回建造或放弃。互摸是被单方摸的时间极限逼出来的——在单方摸即将滑入崩塌时，如果关系中出现了一个可被双方同时触到的共同材料（在本案中是那个“不知道说什么”的尴尬），一个人（儿子）在同一时刻摸到了它并选择不绕开、不嘲讽、不撤退，而是用话语指认了它，互摸就在那个共同触探中被发生出来。互摸不是单方摸的社会化升级——它是单方摸在时间中走到边界处，被另一个人的另一个摸姿态截住、接住、然后一起站住的那个瞬间。

这个结构切开了马丁·布伯“我-你”关系所无法装下的辨别面。在我-你关系中，“我”以完整的、无保留的当下性朝向你——不把你当作物、不把你当作经验对象的集合，而是把你作为整全的、不可被归类的“你”来相遇。布伯对“你”的非对象化姿态与摸高度共振，但切割面在于：在我-你关系中，那个朝向你、与你相遇的“我”，被预设为已经具备了一种能够进行这种相遇的姿态——它放下了利用、放下了占有、放下了将你物化的意向，从而进入了一种纯粹的、具有神学意味的“相遇”境界。而摸的核心动作，恰恰不是朝向这个境界的跃升，而是回撤——“我”在摸中，不是在练习一种更纯粹的相遇姿态，而是在触摸自己为什么总是在无意识中把对方当作物来处理。摸发生在布伯所描述的那个“我-你”相遇之前——它是把阻碍我-你相遇的那些无意识的抓取、焦虑、需要被认可，一点一点摸到的过程。布伯的框架没有为“那个无法进入我-你相遇的人该怎么办”留出操作空间。摸留了。

同样的切割也适用于列维纳斯。列维纳斯的“面对面”伦理恰恰击中了建造模型的要害——将他人主题化、用概念抓住他，就是对他者性的暴力。他者不能被理解，只能被回应。摸与列维纳斯的深层共鸣在于两者都反对将他者归拢进认知框架。但切割面在于：列维纳斯的“回应”是无尽的责任——主体被他者的面孔无限地要求着，永远无法还清这份伦理债务。摸则承认，在深度关系中，恰恰是对“我应该无限地为你负责”这一伦理姿态的未经检视，会制造出摸必须去拆的那个东西——一种以“我为你”为名的道德自我维护。“我为你”可以变成一种极隐蔽的建造：理解者从“我在理解你”升级为“我在为你负责”，在这个升级中，理解者的位置不但没有被拆除，反而被伦理地加固了。摸不是不作为，而是在每一次“我为你”之前先摸一下：这个“为你”里面，有多少是在满足我对自己的道德形象的需要？

梅洛-庞蒂在讨论触摸时给出了一个极其精微的现象学描述：我的左手摸右手时，被摸的右手立刻变成了摸着的，触摸者与被触摸者的角色在同一个身体内部不断翻转——这就是“可逆性”。互摸与可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可逆性所描述的那个能够随时翻转的主体间性是发生在同一个身体世界内部的——左手摸右手之所以能立即翻转，是因为它们同属一个肉身。摸要处理的问题，恰恰是身体世界之外的、不可被可逆性跨越的东西：两个人在权力不对等、历史不对等、痛苦不对等的条件下，“我摸你”的感觉和“你摸我”的感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不可互换的质地。父亲的摸和儿子的摸不同质。父亲摸到的，是自己想要获得认可的急切；儿子摸到的，是从小到大父亲的身体信号里携带

的一种无可逃遁的评价。这两者之间没有可逆性——父亲无法通过“我也在摸”来体验到儿子在那刻肉体里直冲上来的那根被触发时绷紧的弦。互摸不是可逆性的社会版本；互摸恰恰是对不可逆性的承受——两个人在摸，但摸到的东西不可互换，摸到的重量不可兑换。[4]

（六）摸的可观察特征与发生学定位

摸不是一种内省黑箱。它在互动中留下了可以被追踪的痕迹，这些痕迹构成了摸区别于建造、相互性技术与正念技能的行为层辨别特征。需要强调的是，以下特征不是“摸的客观指标”——它们尚未经过实证检验的校准，而是基于本文理论建构所推导出的待验证的行为假设。它们的理论功能，是让摸从一个不可证伪的内省概念，变为一个可以被经验研究检验的假言框架。

第一，暂停的类型学区分。在摸正在发生的互动中，理解者在自己即将执行一个旧习惯性话语动作时，会出现一种可被感知的暂停。它与修辞性停顿（“让我想想……嗯，你说得对”）的区别在于：前者在一个习惯性反应应该出现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未被填充的空；在这个空里，旧反应不是被另一个反应替代了，而是没有发生。这种暂停通常伴有副语言标记（微弱的声门塞音、未完的吸气、身体姿态的微弱退后），其时长与自然语轮转换间隔有可测度的差异。重要的是，这个暂停是不可逆的——不像表演者在“真诚地停顿”后立即接上一段精心准备的展示真诚的话语，摸者的暂停是空地，没有后续的展示性叙事来填补。

第二，自我指涉性修正的特殊形式。摸者在互动中会产出一种特定类型的话语修正：它不是修正自己对于对方判断的内容（“我是说他自私……哦不，我是说他需要空间”），而是修正自己话语的预设。例如，“你要多注意休息”——这句话被说出一半，随后被搁置。搁置的原因不是“我用了错误的词”，而是“我摸到了这句话底下有一个推力”。这类修正的标记是撤回后立即填充替代话语，话语轨迹上出现一个不可逆的中断。这与常规的自我修正不同——后者服务于更精确地表达意图，前者服务于撤销意图本身被执行的通道。

第三，判断句的悬置与表演性悬置的区分。摸者在互动中对于自己生出的判断性念头会出现一种特定的语言标记：在生成判断后附加一个非强化性的、自我指涉的括弧（“但我也知道我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你听听就好”），且不追随这个括弧以新的判断。表演者在做出“不判断”的姿态时，也会使用类似的语言标记，但区别在于：表演者的“不判断”带有一种可觉察的用力——他在用“不判断”来让你看到他的不判断；而摸者的不判断，只是判断不再急迫了，没有让你看的意思。两者的区分在长时段互动中可以从话语节奏与副语言线索上被编码。

第四，主体间的一致性与“预期落空”的共同报告。互摸的另一个可追踪特征出现在第三方访谈中。当分别询问双方“刚才那一刻，你感觉到对方在做什么”时，双方的主体报告可能出现一种特定的一致性：不是说“他说了同样的话”，而是说“他没有做我预期中他会做的事”。这种“预期落空”的一致性——双方都报告了对方的某种习惯性反应缺席——是互摸在关系中的行为痕迹。这表明摸不是

在个体心理内部运行的事件，而是一个可以被他从外部观察到的互动性成就。

摸的发生学定位在此需要被严格锚定：摸不是建造的替代品或升级版。它不是理解的“本质”或“真正形态”。它是建造在自己的工序全部穷尽、却发现自己的每一个操作都在加固理解者位置的那个节点上，被矛盾逼出来的一种重组姿态。这个定位将摸与一切“以抵达确定认知结果为目的”的理解活动区分开来——在那些日常的、功能性的理解情境中，建造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摸不是在普遍意义上“优于”建造，它只是在建造触到自身边界后，不再硬往前走的那一步。这个自我限定是发生学诚实的底线。

四、反驳与回应

（一）权力与结构性不对称：摸是否只是另一种温情的支配？

最具威胁性的反驳来自权力分析。在亲子、师生、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中，权力差异是结构性的：父亲拥有经济资源、社会资本与制度化的家长权威；教师握有评分、升学推荐与课堂话语的分配权；治疗师占有专业知识的定义权、正常/异常的判断权、甚至来访者的时间与金钱。在这些条件下，主张“互摸”是否遮蔽了支配？父亲可以宣称“我在摸”，但他的“摸”仍然发生在一个他随时可以退回其权威地位的关系地形上。儿子可以选择不参与，但儿子不参与的后果（进一步的冲突、可能的愧疚、被家庭边缘化的焦虑）与父亲不参与的后果完全不对称。如果权力不对称是任何亲子关系的构成性条件，那么“互摸”要么是虚假的——只是在支配的表面涂上一层柔和的修辞——要么是极其罕见的、只在权力被实际缓解的特殊时刻才可能暂时出现的理想型。

这个反驳是致命的。本文的回应承认其部分有效性，但需要做出精确的限定。

摸不是在“取消”权力差异。父亲摸到了自己想要评价儿子的冲动被什么所驱动，这并不改变他作为父亲所拥有的结构性权力。儿子被摸到的那个“每次听到父亲说话前身体就已经绷紧的弦”，也不会因为父亲在摸而消失。那个弦是二十年刻下来的。摸不是一个橡皮擦。

但摸在权力地形上确实改变了某件事。在未摸的状态下，父亲的权力不只是“存在”——它在每一次互动中被自动执行。父亲的那个习惯性的追问、评价、表情，不是他在每次做之前都经过深思熟虑的权力行使——它们是已经被内化到无需思考的自动化操作。自动化是权力最高的运作效率：它让支配者的意图和被支配者的反应都不再需要经过意识的检视。摸在这个自动化链条上插入了一个延迟。父亲在开口前的半秒钟，那个被摸到的旧需要自己在身体里浮现了一下——不是他用意志“抑制”住了旧习惯，而是旧习惯在执行过程中碰到了一块被摸过的、不再光滑的地面，自己踉跄了一下。这个踉跄，就是权力执行的一次微小中断。

在中断发生的那个瞬间，权力的结构性不对称没有被消除——父亲的权威位置仍然是他的位置，儿子仍然站在那个位置的下方。但是在这个特定的瞬间，父亲没有做他一直以来会做的事；儿子

也没有接收到他一直以来会收到的信号。两个人的脚本都没有如期播放。这个中断的积累——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几十上百次被摸到的瞬间中，旧脚本的执行越来越少地被自动触发——在长时间尺度上，确实会改变关系的质地。它不改变结构，但它改变了结构被执行的频率和必然性。当权力的行使从“必然自动发生”转变为“有时发生有时不发生”时，权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命运——它开始有孔。有孔的结构，仍然是结构，但已经不是同一块结构了。

这个回应同时承认摸的限度：摸不是结构性的解放。它不能替代制度性的权力重新分配。在极端不对称的关系中（如严重虐待性的家庭、独裁式的教室），摸作为互动的姿态可能完全无法发生，因为掌握权力的一方没有任何动力去摸，而被权力碾压的一方缺乏摸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安全感。摸的理论适用范围不是“所有关系”，而是“那些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冒险意愿、但被长期不对等固化为僵局的关系”。这个限定不是理论的退缩，而是理论的诚实边界。

（二）瘫痪反驳与社会行动：如果理解永不抵达，决断如何可能？

第二个致命反驳来自实践领域。如果理解永远停留在摸中、永不收束为结构，那么需要决断的实践情境——法庭判决、医学诊断、教育评分、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法官不能对被告说“我还在摸你”；医生不能在开刀时说“我们摸一下这个肿瘤再看”。这些情境要求结构化的理解：一个可以被辩护的判断，一个可以承担后果的决定。如果摸不能给出这些结构，那么摸的适用范围就只能被限定在“后创伤式的深度关系”这一极窄领域，而不能再自称为一种对“理解”本身的普遍反思。

这个反驳必须被正面接受。本文的回应是：摸不是理解的普遍形态，也不是建造的替代品。摸是从建造的失效中发生的，而不是从建造的功能中发生的。

建造——归拢矛盾材料、生成判断、固着为可操作的结构——在绝大多数实践情境中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法官必须建造一个判决结构，教师必须建造一个评分结构。摸不废除建造。摸只是在建造的进程中——尤其是在那些建造不会自动触及的位置性不对等中——提供了建造本身所没有的东西：建造者在建造时对自己“为什么需要建这个结构”的触觉。

医生当然要做诊断。但一个在诊室里被自己摸过的医生，可能会在被病人反复追问时，少一句“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的防御性权威宣称，多一句“我理解你担心的是什么，我也有不确定的地方，但我们一起看一下”。后一句话同样是诊断语境中的话语，但它不是“正确的诊断”的替代品，而是“做诊断的那个人”的姿态变化。摸不让他改诊断。摸让他做诊断时少了一层对“我必须正确”的焦虑——而那层焦虑，恰恰是许多医患关系恶化的隐性驱动器。

教师当然要评分。但一个摸过自己的急切的教师——摸过“这个学生没听懂让我感觉自己教得不好”里面那种刺痛——可能在把试卷发回给学生时，不说“你这道题怎么会错”，而说“我看了一下，你在这一步和课堂上的解法不一致——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这两句话都是教育的正常话语。区别不在教学技术上。区别在说出第一句话时，教师站的位置是评分者的位置；说出第二句话时，教

师暂时从评分者的位置上向外迈了半步，站到了和学生并肩看那张卷子的位置上。

摸不是不做事。是不在做的时候，把自己正在“做这件事的人”的那个位置，也放在了自己触觉的范围之内。这个位置一旦被持续地触到，它释放出来的那个空间——那个做的人和对方之间不再只有“做”所定义的关系——就是摸在实践领域可能发生的场所。

（三）认识论反驳与认知发展的边界：摸是否导致相对主义？儿童的认知结构替换如何解释？

两个紧密关联的反驳在此必须被正面回应。

第一个是认识论反驳：如果理解始终停留在摸中，永不收束为可辩护的判断，那么如何避免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在心理治疗中，如果分析师永远只是在“摸”而不做出解释，来访者如何获得认知层面的整合？在教育中，如果教师永远只是在“摸”自己的位置而不给出结构化的知识，学生如何获得可迁移的能力？

本文的回应明确承认：摸不是对认知结构的否定，而是在特定关系时刻对认知结构之暴力性的悬置。在悬置之后，重新进入结构的条件是什么？摸与建造之间的循环关系如何运作？

摸的发生已经包含了重新进入建造的通道。当互摸使得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位置性不对等被足够地松动后，建造可以重新启动——但此时的建造，和旧建造在一个关键点上不同：建造者不再需要用“我是正确理解你的那个人”来维护自我。他可以建造，但他建造出来的那个结构，不再是他自我叙事的承重墙。这意味着，这个结构本身是轻的——它可以被对方反驳、修正、甚至扔掉，而建造者不会因此觉得“我被否定了”。摸之后的建造，不再是自我维护的工程，而是在共同触探的间隙中临时搭建的可拆卸脚手架。它并不通向一个终极的“正确理解”，它只是让两个人在摸的间隙里，有一个可以暂时站在同一块板上的位置。

第二个是发展心理学反驳：儿童认知发展中的大量证据表明，认知结构确实会经历从旧到新的替换——从具体运算到形式运算，从前概念到科学概念。如果本文的论证是“认知结构的替换模型在理解活动中会失效”，那么它如何解释这些已经被反复验证的认知发展事实？

这个反驳所需要的回应，是摸的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定。摸的主要适用对象，不是基础认知结构的习得——儿童在掌握守恒概念、学习数学运算规则时，这些认知结构的替换确实发生在发生，并且建构论的描述在其适用范围内是有效的。摸所针对的，是那些自我深度卷入的理解活动——当理解者所试图理解的，不是一个客观的、可以与理解者的自我叙事保持距离的知识对象，而是一个与理解者自身的身份、情感、关系史紧密纠缠的他者（或他者所持有的、让理解者感到自己正在被判断的经验）时，认知结构的替换模型触到了它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上，旧结构之所以不能被新结构“替代”，不是因为新结构不够好，而是因为旧结构本身就是理解者用来维护自我的那块地基——替换它，意味着理解者要从自己所站的位置上下来，而建造工序中没有“让自己站不稳”这个操作。摸，就是这个让自己站不稳的操作。它不是让认知结构从不正确走向正确，而是让认知建造者的自我位基暂

时悬空。这个现象不发生在儿童学习分数除法的认知过程中——它发生在那个孩子长大之后，面对他的父亲时。

五、摸的边界：与邻近理论的不可还原差异

（一）与教育现象学的对话：摸与“教学之弱”

当代教育现象学中，Gert Biesta对“教学之弱”的论证与摸有着深刻的共振。Biesta指出，教育关系不可被简化为学习结果或认知建构——教育不是一种“输入—产出”的技术过程，而是一种主体间的、无法被完全控制的关系性事件。教育的核心在于一种“对不可预测性的回应”——这种回应不是弱点，而是教育作为存在性相遇的构成性条件。这与摸对“抵达”欲望的松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边界在于：Biesta的“教学之弱”所描述的，仍然是教育者在一个教育关系中的伦理姿态——教师悬置自己对确定结果的欲望，以保留学生的“他者性”显现的空间。这是一种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论证：它告诉教师“你应该弱”。而摸不是规范性的——“你应该摸”这句话在发生学上是无效的，因为摸的发生条件不是道德自觉，而是建造驱力在特定关系矛盾中的反噬。摸不告诉任何人应该怎么做，它只是描述了：当建造穷尽、旧驱力的自动执行通道被堵死时，一种非建造性的重组如何在承受中被结算出来。Biesta的“弱”是一种被选择的教育美德；摸是一种被逼出的关系性重组。美德可以被提倡，重组不能——它只能发生在矛盾够紧的时候。

（二）与情境学习理论的对话：摸与“身份的渐进变迁”

Lave与Wenger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及其后续发展，将学习从认知结构的替换重新概念化为身份在共同体中的渐进变迁。学习者不是用新图式替代旧图式，而是从一个位置的边缘向中心移动——这个移动伴随着身份的改变、参与方式的重组、以及与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关系重配置。在这个框架中，学习不是“替换”而是“成为”。

摸与情境学习理论的深层亲和力在于：两者都不将学习视为孤立心灵内部的认知事件，而是将其锚定在关系性的位置变迁中。但切割面在于：情境学习理论所预设的共同体，是一个可以被边缘性参与然后渐进进入的共同体——它有一个中心，有一条从边缘通往中心的路径，有一个可以被辨认为“充分参与”的身份终点。而摸所面对的关系情境，往往不构成一个“共同体”——父子之间、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不是一个有共享实践、共享规范、共享身份梯阶的实践共同体。儿子不是父亲所在的那个共同体的“边缘参与者”；儿子被迫参与了一个他没有选择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没有从边缘到中心的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抛进了一个他无法同意的位置分配里。

更重要的是，在情境学习理论中，“学习者身份”本身——那个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主体的可辨识性——是被理论预设的。学习者虽然在变化，但他始终可以被辨识为“正在成为什么的人”。而摸的发生学核心，恰恰是“那个可以被辨识的自我”本身被暂时悬置——父亲不再知道“我是谁”，儿子在

互摸的那一刻也不是“正在成为什么”的人，而是“暂时不知道自己在成为什么”的人。情境学习理论中有位置变迁，但没有那个位置的暂时悬空。摸，就是那个悬空。

（三）与当代关系治疗理论的对话：摸与“反思性对话”

社会建构主义在治疗领域的推进，明确将治疗师从“知识建构者”的位置上撤下。McNamee与Gergen所描述的“反思性对话”，要求治疗师持续将注意力转向治疗过程的即时性——治疗师不是在对来访者的内容做解释，而是在对“我们此刻正在做什么”做共同反思。这与摸所描述的“触探方向扭转向内”在操作上高度重合。

切割面仍然是目的论上的。反思性对话的操作，发生在治疗情境的目的论空间内——治疗师进行过程性评论，是为了松动来访者的旧有叙事，为新的、更解放性的叙事创造空间。反思性对话有一个治疗性的“为了”——它是方法。方法可以被学习、被技术化、被在适当的时机调用。而摸不是方法。摸是从“方法失效”的废墟中发生的东西——父亲不是在调用一个叫做“过程性评论”的技术；他是在他所有学到的技术都做过了、都失效了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的那个空里，被他的旧驱力反噬了。反思性对话可以被训练，摸不能被训练——它只能在建造的废墟上被逼出来。

六、结论：摸的边界与证伪条件

本文的起点是生长论的地基被撬开。在这块此前从未被翻动的地面下面，本文追踪了建造模型在真实的、被个人史填满的理解现场中如何反复遭遇同一个失效模式：建造者穷尽了所有建造工序，但建造者的位置——那个“我需要通过正确理解你来维护我的自我叙事”的位置——从未被建造工序本身触碰过。从这个失效的裂缝中，本文结算出了摸这一发生形态：一种以触探理解者自身需要与姿态为首要动作、不以抵达确定的认知结果为驱力、在互不收束的触探中让理解者与被理解者的固定角色分配松动的关系性活动。它不是建造的反面，是建造走到尽头、发现自己再走下去只是在加固自己脚下的地基时，把脚从地基上挪开的那个动作。

摸与关系精神分析的相互性技术的最深区别在于：关系精神分析的相互性仍然在一个治疗性的“为了”中运行——分析师碰触自己的主体性，是为了最终帮助来访者松动其病理结构。正念的不评判觉察是一种可以在无矛盾情境中被独立练习的心理技能，而摸是被特定的关系矛盾逼出来的发生姿态——它不能被练习，它只能在建造驱力反噬自身的那个特定现场被发生出来。

摸的证伪条件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一个在经验上可被追踪的判据。如果在三个以上具有实质性积怨的深度关系（亲子、伴侣、长程治疗联盟）中，满足以下全部条件：(a) 建造模型的所有已知精细化版本（增加关系维度、情感维度、无意识维度）都已被充分而诚实地应用，且应用的持续时间不少于一年；(b) 在此期间，互动的可观察特征（以谈话分析或过程研究的方法论编码）均未出现本文所描述的摸的行为特征——即前文所述的暂停、不可逆的自我指涉性修正、判断句悬

置与预期落空的一致性报告；(c)但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关系质量、被理解感、旧冲突模式的僵化程度等指标（以成熟的标准化量表测量）发生了统计上显著的改善，且效应量不低于已有文献中“摸型干预”所报告的效应量——那么，摸作为一个解释框架就必须被严重质疑。如果在任何一个此类关系中，建造模型的精细化版本能够在相同的时间窗口内，产生同等或更优的改善效果，且这种改善在一年以上的随访中不衰减，则摸的不可还原性被否定。

这些证伪条件不是为了让摸刀枪不入。恰恰相反，它们是为了让摸从一个不可证伪的万能标签变回一个可以被具体否证的判断。摸可以被否定。只要有人在建造的框架内，用更精细的建造工序，真正拆除了建造者脚下的那块地基——也就是让理解者不再需要通过正确理解对方来维护自我——那么摸就是可以被扔掉的。本文的判断恰恰是这个：建造做不到这件事。不是因为它做得不够好，而是因为它设计的全部工序都服务于另一件事——让理解者正确。如果建造者有一天证明了我错了，摸这个结构就可以被放回它出生的裂缝里，不再被需要。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摸作为一个临时停靠的判断，留在这里。

注释

[1] 本文中“生长”一词不取生物学或发展心理学中的有机体发育语义，而专指上述定义的理解模型。下文“建造”、“抵达”等隐喻均在此严格定义内使用。

[2] 本文对香农的引述仅限于其1948年论文中的工程定义，不涉及后续信息论哲学对该模型的扩展与诠释。文中所考察的“信息传输论的日常操作逻辑”，特指未受香农本人方法自觉约束的、在社会实践层面被简化使用的模型。

[3] 本节的个案材料取自一项长期田野调查，其中涉及的人物身份、互动细节与时间节点均已完成严格的匿名化与合成处理。任何与真实个体的雷同均为巧合。个案的理论功能不在于宣称经验上的典型性，而在于让摸的发生学动力在一个可追踪的具体序列中被看见。

[4] 本文对马丁·布伯、列维纳斯与梅洛-庞蒂的解读，严格限定于所引用的具体文本内部，聚焦于这些文本中所呈现的理解关系结构与“摸”的结构性差异。这不构成对他们各自哲学体系的整体评述，也不否认其思想中可能存在着与摸更深层的亲和性。

参考文献

- Aron, L. (1996). *A Meeting of Minds: Mutuality in Psychoanalysis*.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 Biesta, G. (2013). *The Beautiful Risk of Education*.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 Biesta, G. (2014). *The Rediscovery of Teaching*. New York: Routledge.
- Bion, W. R. (1970).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Tavistock.
-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 (2007). The foundational level of psychodynamic meaning: Implicit process in relation to conflict, defense, and the dynamic unconscio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8(4), 843-860.
- Buber, M. (1923). *I and Thou*. (R. G. Smith, Tra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Dewey, J. (1938).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Gergen, K. J. (2009).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bat-Zinn, J. (1990). *Full Catastrophe Living: Using the Wisdom of Your Body and Mind to Face Stress, Pain, and Illness*. New York: Delacorte.
- Lave, J., &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nas, E. (1961).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A. Lingis, Tran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McNamee, S., & Gergen, K. J. (Eds.). (1992). *Therapy as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 Merleau-Ponty, M. (1964).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A. Lingis,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S. A. (1988). *Relation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 An Inte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 S. (1877). The fixation of belief.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2, 1-15.
- Piaget, J. (1952).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M. Cook,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Rogers, C. R. (1961). *On Becoming a Person: 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ap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Shannon, C. E. (194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3), 379-423.

- Siegel, D. J. (2007). *The Mindful Brain: Reflection and Attunement in the Cultivation of Well-Being*. New York: W. W. Norton.
- Stern, D. N., Sander, L. W., Nahum, J. P., Harrison, A. M., Lyons-Ruth, K., Morgan, A. C., Bruschweiler-Stern, N., & Tronick, E. Z. (1998). Non-interpre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he 'something more' than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9(5), 903-921.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